

社会融合对政府工作 满意度的户籍分化效应

——基于 CSS2011 数据的实证分析

柳建坤 张柏杨 陈云松

提 要：本文从政府治理视角讨论了社会融合对不同户籍群体评价政府绩效的效应差异问题。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和城市宏观数据的分析表明，社会融合对进城农民积极评价政府绩效有着比市民更强的提升效应。具体而言，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性文化活动频率的增加以及群体内部的内质性交往，都能够显著增强进城农民对政府解决社会不平等、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优化行政能力等工作的积极评价，而本地人口在经济地位提升以及以内质性交往为主的心理融合的影响下反而降低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但在身份融合的层面上，城市认同和本地认同并未使进城农民更积极地评价政府工作，甚至降低了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满意度。在政策意涵上，城市政府需要针对流动人口重点解决劳动力市场分割以及公共品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同时缩小市民内部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并以此为基础激励不同户籍群体间的异质性交往和认同感的强化，从而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并促进城市治理能力稳步提升。

关键词：流动人口 本地市民 社会融合 政府绩效评价

一、引 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文化的内核，也是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维系统治秩序的基本政治原则。与传统社会相比，在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对象已经发生了从具象化个人到抽象化组织的重大转变，使主导性的评价标准发生了从“天命”向“绩效”的理性化转型（赵鼎

新,2012)。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家政治的运作逻辑,即对于主要责任方的中央及地方政府而言,构筑自身合法性愈加取决于其对公民在经济生活、社会治安以及国家安全等领域权益的实现程度。而在政治意义之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也是行政体制内部进行自主性革新的反馈机制,对于优化组织架构优化、提升治理能力以及重塑社会形象均具有现实意义。

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城镇化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人口的分布格局,庞大的流动人口开始在大中城市高密度集聚。这一过程虽然使城市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但也导致传统“户籍二元化”治理模式日益难以适应治理对象层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户籍制度以及依托其所建立的公共品定量分配体制等条件的约束,城市政府与数量有限的市民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高度稳定的“总体性支配”关系(孙立平等,1994)。^①但在进入由市场力量驱动的社会转型期后,利益分配机制的自由化在市民内部制造了日趋明显的阶层分化,针对政府的怨恨情绪开始滋生并向全社会蔓延(成伯清,2009)。而单位制的瓦解更削弱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约制,致使各种都市维权运动,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开始集中爆发(冯仕政,2006)。在传统的城市治理关系日益紧张之外,流动人口这一外部因素的出现则真正使城市成为社会矛盾生产的核心场域。一方面,外地人的流动过程对本地弱势群体而言意味着愈加不利的生活境遇,即影响了他们在工作机会获取和公共服务资源分配中的既得利益,因而使本地人在态度和行为层面表现出强烈的排外性。但作为互动关系的另一方,流动人口长期在城镇内部二元分割体制下所遭受的各种制度性不平等和人为歧视,都为这一群体在城市争取“公民权(citizenship)”的实际行动提供了激励(苏黛瑞,2009)。总的来说,城市社会的治理关系不但因市民在制度转型期间的利益受挫而日趋紧张,更由于传统粗放型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所引发的社会融合问题而更加复杂。这无疑对地方政府的职能类型、工作方式以及绩效水平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大增加了社会治理以及获取合法性的难度,因而对社会运行的持久性与高效性构成了严峻挑战。

面对当代中国城市政府治理关系的变化和困境,本文试图在实证层面了解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差异,并且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探寻政治态度

^①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49年到1978年,中国城市化率仅从10.64%增长至17.92%。在人口规模意义上,农村地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绝对核心地位,而城市政府的治理压力则相对较小。

的群体分化机制。在以往的社会融合研究中，多数学者是以流动人口作为分析对象并侧重从融入的影响因素展开讨论，尤其关注制度特征（陈云松、张翼，2015）或个体因素（任远、乔楠，2010）对其融入城市社会的实际影响。但学术界针对社会融合带来的效果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思维观念等个体层面（悦中山等，2012），但尚未对其所产生的宏观效应进行专门讨论。实际上，由于中国城市社会的各个领域或由政府机构组织，或受政府机构影响，因而任何个人的日常生活都需要在由政府所提供的结构性条件下才能展开。正是在微观的个体行动与宏观的制度环境的紧密联系下，城市社会的治理关系由本地人以及外地人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而直接、全面且深刻地反映出来。因此，本研究将在实证层面补充以往研究在这一因果链条上所缺失的环节，致力于揭示政府治理认受性形成的微观机制，探索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政府实施绩效优化策略，为提升社会治理的人本性、精准性和现代性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术界掀起了关于满意度的研究热潮。组织研究领域的学者率先对员工满意度问题进行了讨论（Herzberg，1966）。随后，针对生活满意度（Requena，2003）以及社区生活满意度（Auh & Cook，2009）等议题的深入讨论也相继展开。但这一时期对满意度的关注焦点集中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西方政府的治理思路发生了从“政府本位”向“公民本位”的转变（陈振明，2003），民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才日益得到理论界和政策界的重视，并以此作为评估政府绩效水平、合法性状态以及政权稳固程度的主要参考。

现有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来解释政府工作满意度形成及变化的逻辑。首先，虽然政府的工作表现在公众层面存在认知加工的过程，由此才能形成对政府绩效的主观评价，但政府被公众所认可的最基本条件仍是其在实际行动中所产生的具体绩效。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基本考量。库萨克（Cusack，1999）在以德国为案例的研究中发现，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极大地提升了本国民众对其的认可程度，并且这一关联在东德和西德这两个在文化背景基本类似，但在

政治制度，特别是经济绩效上差异明显的国家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而范里津（Van Ryzin，2007）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公共服务上。他在以纽约市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中发现，市政府在某些关键的民生性财政支出的增加将显著提升当地民众对其的满意度。上述研究都是在稳定社会秩序中展开的，而一旦社会的正常功能遭到破坏，就可能使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在非常态的情况下发生巨大变化。在陆奇斌等（2010）以汶川地震为背景的研究中发现，当地政府在灾害应对时的工作能力对民众评价其表现产生了显著影响。尉建文和谢镇荣（2015）进一步发现，在灾后重建阶段，由于基层政府或者以“变通”的策略来执行中央及上级政府的政策，或者以“共谋”的方式来应付政策验收，致使有效治理的目标难以实现，这会导致当地居民对其的评价偏低。

其次，个体对事物的认识具有历时性变化的特点，因而其对政府当前工作的评价受到其先前认知的影响。在对消费者的研究中，奥利弗（Oliver，1980）发现这一群体的满意度实际上是他们对商品的期望或预期的函数，即人们对商品或服务的评价会受到他们之前对其特征或收益的期望的显著影响。换句话说，这种期望是基于个体对特定商品的性能或品质有过真实体验后而形成的主观认知，人们以此作为评估同一商品在当前所带来的实际效益的参照，而比较后的结果最终反映在情绪和态度上。类似地，在过去的时间点上，公众对政府绩效会给予特定的评价，并以此期望政府在之后的表现能够与此类似或更佳。但如果政府的实际表现低于这种期望，就会导致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发生下降。由此形成的关于政府满意度的“期望失验理论”（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Theory）也获得了大量经验证据的支持。例如，国外研究者发现，纽约市民众对当地政府在社会服务质量的评价，既受到政府当前实际表现的影响，又与其以往的工作成就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对政府的过高期望会使得民众的满意度提升较为有限（Van Ryzin，2004）。萨利希和海达里（Salehi & Heydari，2012）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都市之外的乡村社会，证实了居民对当地政府的绩效评价会因认知落差而发生变化。除地方层面外，“期望失验”机制也被证实存在于国家层面，例如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工作表现评价也受到其对后者的期望的影响（Morgeson，2013）。具体到中国社会，国内学者对汶川地震后官民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不仅发现当地居民对政府的满意度出现了随时间推移而下降的趋势，而且证实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民众对政府在救灾以及恢复重建上的过高期望与政府的有效治理不足形成了鲜明反差，进而造成其在心理上出现了巨大落差，因而对政府的评价趋于消极（张欢等，2008）。

最后，从公众角度来看，其自身的社会属性也被视为影响政府工作满意度的重

要因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其生活境况以及形成对政府绩效水平的认知的最基本条件。在以西方社会为背景的研究中，罗斯克鲁格等（Roskrugge et al. , 2013）发现，收入、职业以及住房等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在个体生命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即人们在不同时间点的社会经济地位会使政府形象认知的构建形成显著差异。在中国，张翼（2008）深入分析了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的形成机制，发现在同一制度环境中的“获益者”要比“失意者”有着更加积极的政治态度，即对现有制度的支持度更高以及对政府工作的评价较为正面。此外，周长城和徐鹏（2014）考察了中国村镇层级的政府绩效在民众中的受认可程度，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历时性变化是影响人们评价政府绩效的最主要因素。王晓莹和罗教讲（2016）在针对覆盖城乡的全国性样本进行分析后发现，生活境遇不同的个体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也存在显著区别。

以上三个视角充分展现了公众与政府分别作为评价者与评价对象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但以一种更宽广的分析视角来看，由于个体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参与社会行动的，因此其对特定事物的认知和判断并不完全取决于外在客体或自身主体的性质，而会在与他人的持续互动过程中不断形成、修正以及定型。在个体层面，每个人所处的关系网以及嵌入社会整体网就会影响其对政府工作表现的看法，因而个体社会资本日益得到学者们的重视。例如，在帕特南（Putnam, 2000）所进行的经典研究中，“二战”后美国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衰退就与结社活动的频率和质量下降存在紧密联系，因为这严重影响了公众彼此间的信任、规范的建立。罗家德等（2014）则从社会资本视角对汶川地震后村民对基层政府满意度的下降进行了分析，发现个体社会资本的多寡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以互动论来解释政府工作满意度的逻辑中，“关系”不仅仅是以原子化个人而构建起来，实际上也涵盖在组织和身份上发生分野的异质性群体。事实上，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野会在意识层面强化彼此间的区分，最终在群体的社会态度和外部性行动上凸显这种异质性（Mannheim, 1936）。因此，政治学研究者强调应着眼于宏观制度环境中经济资源以及政治权利的分配差异来审视群体政治态度的形成机制（Clarke et al. , 1993）。而在中国，户籍制度则是贯穿改革前后社会结构分化最为基本的机制之一。塞奇（Saich, 2006）强调，城乡差异是解释当代中国民众评价政府行为的重要视角，并在研究中证实市民和农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存在明显的不同。但需要注意到，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使城乡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户籍制度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内部的二元分割体制，表现为在地理上共存，但在地位上隔离的市民与流

动人口。而当各自的生活世界从分离到交融，形塑其态度的利益认知逻辑会因关系的生成而发生改变，并进一步反映在对城市政府的心理态度上。虽然既有文献已对单一的户籍群体有所涉及，但缺乏对同质性空间内的异质性群体的比较分析。这一领域的空白是本研究开展的起点。接下来，我们将依托于社会融合理论并结合中国制度转型的现实背景，详细阐释市民与流动人口的利益认知模式的形成机制及其与政府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内在关联。

三、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融入与接纳：社会融合的分析路径

改革以来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为国内的移民研究提供了现实支撑，促进了有关流动人口的学术成果迅速积累，在构建本土化理论（杨菊华，2009）、设计及优化测量指标体系（风笑天，2004）、拓展研究内容（王春光，2003）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特别地，学界在探究影响流动人口融合的影响因素时表现出典型的个体与制度的两种解释取向。从微观层面来看，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社会前后所处的弱势地位是造成其出现适应与融入困难的直接原因，这些不利条件具体表现为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任远、邬民乐，2006）、支持力度弱的社会网络（李树茁等，2008）以及低频率的异质性社会交往（王春光，2001）。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虽然脱离了户籍制度所塑造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限制，但其在身份上的制度性约束却很难通过空间流动来打破，从而在城市内部面临着工资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陆益龙，2006；彭希哲、郭秀云，2007）。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流动人口在融入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本地市民能否接纳他们，因此也需要关注后者的交往意愿、价值观以及社会心理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刘林平，2008）。

以上实证研究为社会融合的基本过程及其发生机制提供了诸多洞见，但在分析上采取的是一种单向式的研究路径，忽视了“融合”作为一种互动关系对行动者的态度及行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帕克（Park，1928）对社会融合定义为“个体或群体互相渗透（interpenetration）、相互融合（fusion）。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共享历史和经验，相互获得对方的记忆、情感、态度，最终整合于一个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换言之，社会融合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因此需要以一种“动态的、

渐进式的、多维度的、互动的”视角加以详细审视（杨菊华，2009）。宋月萍和陶椰（2012）基于融入与接纳的互动论视角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困境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发现该群体的融入意愿和行为显著地受到本地人对其的接纳意愿的影响。这种在群体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拒斥倾向，既根植于因生活经历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心理区隔，也来源于直接的利益冲突，并且在现实中这两种作用逻辑往往呈现出相互转化的趋势（王嘉顺，2010）。类似地，李煜（2017）以利益威胁与文化排斥构建了关于市民排斥态度的解释框架，并在以上海市市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旧市民和新移民对流动人口的态度都与对各自的利益状态的认知情况密切相关。这意味着背景差异巨大的两类户籍群体在同一场域下进行社会互动时可能会形成截然不同的利益认知模式，进而影响其是否融入城市的选择或者接纳融入者的意愿和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基于单一城市研究所获得的发现很难具有推论总体的信度，并且尚未有研究对流动人口与市民在融入或接纳过程中的利益认知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更重要的是缺少在此基础上对城市治理的进一步探讨。接下来，我们将在中国制度转型的背景下深入剖析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在利益认知模式上的分化逻辑，并探究两者互动关系的变化如何影响行动者对政府绩效的评价。

（二）制度转型、利益认知逻辑分化与政府绩效评价

1978年后的体制转轨使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高度平均且稳定的利益分配结构迅速瓦解，造成社会成员之间开始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而且，个体地位在制度转型前后的升降变迁也反映在心理层面，尤其体现为其对社会平等与社会冲突等问题的认知态度。李路路等（2012）利用全国性抽样数据进行的研究发现，2005—2008年间多数的中国民众认为收入不平等将不断扩大，而且阶层之间的冲突也将日趋严重。这在吴晓刚（Wu，2009）进行的比较研究中得到印证。他发现，相比于香港，大陆民众对分配公平更为敏感，这使他们更难以容忍收入不平等，从而加剧了诱发巨大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更为严重的是，阶层对立情绪的紧张加剧了社会系统的运行风险，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国家政权提出了巨大挑战，集中显示为政府所面临的信任危机。首先在针对农村的研究中，胡荣（2007）发现中央及省市政府在农民中仍保持着较高的权威和信任感，但基层政府的行为和形象受到强烈质疑。在之后的研究中，这种“央强地弱”的信任格局被证实同样存在于城市地区（胡荣等，2011）。但从城

乡比较视角来看,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属地政府层面,城市居民均表现出显著高于农民的信任水平,而后者的低信任主要是其对基层政府的绩效评价较差所导致的(高学德、翟学伟,2013)。然而,一旦农民流入城市就转化为流动人口,与其建立治理关系的主体从乡村政府转变为城市政府,因而与市民共享着同一绩效评价对象。但李培林和李炜(2007)发现,双方的社会态度表现出相反的趋向,并主要是由其各自如何看待自身的利益状态所决定。本文认为,这两类户籍群体在制度转型和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是引致他们利益认知逻辑出现分化的结构性根源,并由此影响到双方对政府工作绩效的评估方式以及具体水平。

首先,市民群体在市场化改革期间有着明显的利益受损经历,这与城市资源分配机制的转型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密切相关。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传统上依靠行政命令运转的福利分配模式被推向市场,这给城市居民带来了物质利益和地位优势感的双重削弱(Solinger,1999)。同时,职业分配机制的市场化也形塑了新的社会分化模式,造成市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怀默霆,2009)。这种生活境遇的下降在结构性不平等的作用下带来了相对剥夺感。马磊和刘欣(2010)在其研究中发现,超过半数的城市居民对分配公平持有消极的判断。他们认为,这主要是由时间和群体意义的相对比较因素(与自己过去的情况与其他市民的情况)所决定,与个体自身的绝对社会地位关联不大。公平感的下降不仅激发了城市弱势阶层对优势阶层的“嫉妒”乃至集体性怨恨(成伯清,2009),而且演化为对政府工作效力的强烈不满,并最终在现实层面呈现为群体性事件甚至是威胁社会秩序的“骚乱”事件(李保臣、李德江,2013)。

另一方面,高速的城镇化进程促使流动人口大规模集聚并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支持。但廉价劳动力的“红利”对于不同阶层的市民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在当地处于社会上层的成员可以在流动人口降低经济成本的效应中获益(Scheve & Slaughter,2001)。但这对中等收入群体却意味着更大的缴税压力(Sniderman & Piazza,2002),特别是处于城镇劳动力市场低端且对城市公共服务依存度较高的弱势市民也因外部性竞争而面临生存境遇恶化的风险(Ceobanu & Escandell,2010; Hainmueller et al.,2011)。在此情况下,多数本地市民极易把外地人构建成想象中的“利益威胁者”,并在行动上加以排斥。而且,王晓莹和罗教讲(2016)发现,市民会把不满情绪发泄到当地政府,集中表现为市民对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会作出负面评价。

其次,虽然传统粗放型城镇化模式具有群体层面的不平等效应,即形塑了城里人

与外地人的新二元分割体制（陈云松、张翼，2015），但这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则产生了时间意义上的利益提升效应。在历史上，中国农民长期面临着农业边际生产效率不断下降的“内卷化”风险，使其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黄宗智，2000）。但这一局面随着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大量非农就业而得到根本性扭转。一方面，农民实际收入在1978—2003年增长了4.5倍，并且农业收入在未来仍具有不断增长的潜力（黄宗智、彭玉生，2007）。另一方面，进城务工的农民平均月收入在2005年为929元（邢春冰，2008），在此后的十年间（2006—2015）其收入增长了约3倍以上（田丰，2017）。

对流动人口而言，绝对收入的持续增长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以及身心健康的改善（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程遥，2012），而且对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意愿不断提高（宋月萍、陶椰，2012），对城市及市民身份的认同感日趋增强（蔡禾、曹志刚，2009）以及形成了一种区别于以往生活经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提式（蔡禾等，2009）。更重要的是，这一全方位的市民化过程使流动人口的认知模式发生了深刻转变。这既表现为外地人对其与市民之间差异感知消失以及对城市生活的高满意度（许传新，2007），又表现在社会态度层面，包括对未来生活的积极预期、相对适中的分配公平感以及与本地市民截然不同的冲突感知（李培林、田丰，2011）。换言之，相比于市民，流动人口遵循“历史决定”逻辑来构建其对利益认知的模式，这并非由“经济决定”逻辑所主导，该群体在与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后就会形成积极的社会态度（李培林、李炜，2007）。

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互动形塑了双方认知自身利益的差异化逻辑，这可能蕴含因“期望失验”而导致的对政府工作的不同评价。前者因空间迁移而获得了时间上的利益增加，由此建构的“历史决定”逻辑使其倾向于对城市政府的绩效作出积极性评价；而制度转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冲击则在历史维度上削弱了市民的绝对利益，并且因群体内部地位分化造成了相对利益的减损，由此分别形成的“历史决定”与“经济决定”逻辑相互叠加，使利益受损的感受明显强化，进而产生对属地政府治理绩效的强烈不满。此外，需要注意到：传统粗放型城镇化模式的后果之一是城镇内部的二元分割体制的形成，其对本地人和外地人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性质，由此导致了这两类群体与城市社会的利益联结方式以及程度的显著区别，确切地说，是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不同（陈云松、张翼，2015）。然而，尽管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合的“量”上明显不足，但基于历史比较的利益认知

逻辑能够为其在带来更多的边际效益，而双重利益认知逻辑则很难为已与城市融合密切的市民带来同样的效果。依此逻辑，社会融合的加深能够使流动人口的“期望失验”趋于正向发展，但对本地人口“期望失验”的积极效果则弱于前者，甚至产生负向效应。由于不同户籍群体的社会融合对各自政府满意度具有差异化效应，我们据此提出本文的核心假说：

社会融合对流动人口评价政府工作的正面效应要强于对本地市民的影响。

学术界认为“社会融合”具有多重内涵。例如，张文宏和雷开春（2009）在针对城市新移民的实证研究中提取了经济、文化、心理和身份等四种融合因子。杨菊华（2010）进一步围绕经济、行为、文化和身份等维度构建了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李培林和田丰（2011）对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分析也是在经济、心理、身份和社交四个层面展开。综合上述研究以及分析数据的特点，本文主要参考陈云松和张翼（2015）基于“经济”、“行为”、“心理”和“身份”等四个维度所构建的社会融合框架，分别关注的是本地市民与进城农民在收入增长、具有城市特征的文化行为、彼此的交往意愿、对城市的地域性认同以及嵌入其中的市民性认同等四个方面的情况。根据我们在之前已经梳理的关于社会融合对政府工作满意度具有户籍分化效应的核心假说，可以提出以下四个子假设：

假设 1：经济收入的提升对流动人口评价政府工作的正面效应要强于对本地市民的影响；

假设 2：城市性文化行为对流动人口评价政府工作的正面效应要强于对本地市民的影响；

假设 3：不同户籍群体的心理趋近对流动人口评价政府工作的正面效应要强于对本地市民的影响；

假设 4：城市性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评价政府工作的正面效应要强于对本地市民的影响。

四、数据、变量与分析策略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涉及个体和城市两个层面。首先，微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11 年 7 月至 11 月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第三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该调查采用多阶段混合概率抽样方式(PPS),抽取了全国 28 个省份的 100 个县(市、区)和 5 大城市所辖的 480 个村(居)委会,共入户访问了 7036 位年满 18 周岁及以上的城乡居民。

在样本筛选过程中,由于 CSS2011 问卷中关于流动人口的题项是围绕农民工群体来设置,因此我们将“流动人口”限定为在调查时所在的城市工作或居住、拥有农业户口的 18 周岁以上的人群,而户口登记地在本地且为非农户口的样本则为“本地市民”。在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城镇人口样本总量为 3205,其中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的数量分别为 2208 和 997。此外,考虑到受访者所在城市间的差异会对其微观特征产生影响,本文从与 CSS2011 的数据年份(2011 年)相一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提取了 85 座城市的人均 GDP 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这两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将其与个体数据进行匹配后进行跨层次分析。

(二) 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在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是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CSS2011 设置了 11 个关于政府绩效评价的问题,涵盖了经济增长、公共服务、信息公开、腐败治理、行政执法等诸多领域。这些题项的评分标准为:1 = 很好;2 = 比较好;3 = 不太好;4 = 很不好;8 = 不清楚。考虑到公众对政治性议题较为敏感,可能导致其回答相对谨慎,因而我们将“不清楚”的回应视为一种中立性评价^①,并将该变量进行重新赋值:1 = 很不好;2 = 不太好;3 = 不清楚;4 = 比较好;5 = 很好。在对上述 11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s)并采用最大方差方法(orthogonal varimax)进行旋转后,得到了三个特征值(eigenvalue)大于 1 的公因子。如表 1 所示,我们按照因子负载系数 ≥ 0.5 的指标归入同一个公因子的通行标准,最终获得“社会公平因子”(信度系数为 0.7376)、“公共服务供给因子”(信度系数为 0.6872)以及“行政能力因子”(信度系数为 0.6813)。为构建适合统计分析的因变量,我们采用了同属一个公因子的各题项标准化后求平均值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上述三方面的政府满意度的取值范围转换为 0~100 之间,以便于后续的线

^① 这种处理在相关文献中较常见,王晓莹和罗教讲(2016)在研究中也把“不清楚”作为一种中立态度。

性模型的拟合以及结果解释。这样，受访者上述三个因变量上的得分越高，表明对政府在相应领域的工作成果越满意。

表 1 对政府 11 项工作的满意度得分的因子分析

变量	社会公平因子	公共服务因子	行政能力因子
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0.1717	0.7460	0.1480
为群众提供社会保障	0.2787	0.7159	0.1106
提供义务教育	0.1510	0.7054	0.0716
保护环境，治理污染	0.0661	0.4040	0.5321
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	0.0263	0.3633	0.6092
廉洁奉公，惩治腐败	0.2028	0.0022	0.7786
依法办事，执法公平	0.2646	0.1199	0.7298
发展经济，增加人们的收入	0.5928	0.3076	0.2213
为中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	0.7711	0.1620	0.1114
扩大就业，增加就业机会	0.7627	0.2182	0.1283
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0.6222	0.0513	0.3659
信度系数 (Cronbach's α)	0.7376	0.6872	0.6813

2. 自变量

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社会融合对城市人口评价政府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户籍分化的现象。因此，在已筛选了城市样本的基础上，我们根据户籍是否属于农业户口生成了区分本地人（赋值为 1）还是外地人（赋值为 0）的二分变量。社会融合是另一个核心解释变量，它包括经济、行为、心理和身份等四个维度，每一维度可以由下列指标所测量。首先，我们参考了以往移民研究对市民与外地人口的利益冲突焦点的分析，将收入水平作为测量经济融合的核心指标，其在 CSS2011 问卷中表现为受访者在 2010 年的个人全部收入，并以对数形式纳入回归分析中（收入为 0 的样本均先加 1 再取对数）。

其次，行为融合最典型的特征是个体表现出更符合现代生活特质的文化活动，尤以体现有闲阶级的文娱活动最为突出。CSS2011 问卷收集了受访者在闲暇时间（周末或节假日）所从事 10 项休闲活动的情况。我们关注的是“观影、看比赛、运动、打牌、书报、户外活动和旅游、使用电脑、歌舞厅”等九类文化活动，并将这些二分变量进行相加后生成一个取值为 0~9 的连续变量。

再次，心理融合最直观的表现是不同户籍群体之间的交往意愿。CSS2011 问卷主要从“聊天”、“一起工作”、“成为邻居”、“成为亲密朋友”和“结成亲家”等五个方面考察了受访者是否愿意与“城里人”或者与“农村人”进行日常互动的意愿，其测量标准为：很愿意 = 1；比较愿意 = 2；不太愿意 = 3；很不愿意 = 5；不好说 = 8。但鉴于该敏感性问题的回答给受访者带来的潜在影响，我们将“不好说”视为一种谨慎且中立态度的表现。同时，为了与其他社会融合指标的作用方向保持一致，交往意愿的取值按照从“很不愿意”到“很愿意”分别被赋予 1~5 分。在此基础上，我们采取主成分分析以及最大方差法来生成了分别针对城里人和农村人交往的综合性心理融合指标，二者均为连续变量。

最后，社会成员的身份认同主要建立在文化归属和地域空间这两个重要的主客观条件之上。对于市民与外地人口而言，这具体表现为“城市身份认同”和“本地身份认同”，并且可以分别从 CSS2011 问卷中询问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城里人”还是“农民”，以及属于“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进行区分。因此，身份融合指标属于两个二分变量。

本文所涉及的控制变量因层级差异而有所不同。个体层面的变量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及其平方、性别、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就业状态、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经济融合的分析除外）。城市层面的变量包括人均 GDP（取对数）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取对数）。表 2 展示了上述全部模型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2 模型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全部样本	本地市民	进城农民	差异显著
	N = 3025	N = 2208	N = 997	
年龄 (岁)	49.47	51.80	44.30	-12.26***
性别 (1 = 男性)		70.21%	29.79%	2.07
婚姻状态 (1 = 有配偶)		67.91%	32.09%	5.47*
政治面貌 (1 = 中共党员)		89.32%	10.68%	104.36***
就业状态 (1 = 在职)		58.72%	41.28%	180.20***
教育年数	9.45	10.24	7.69	-17.02***
经济融合指标				
个人年收入 (元)	16731.19	18763.43	12230.51	-15.19***
行为融合指标				
城市性文化行为	1.07	1.21	0.75	-12.26***

续表

变量	全部样本	本地市民	进城农民	差异显著
	N = 3025	N = 2208	N = 997	
心理融合指标				
与农民的交往意愿	79.31	75.41	87.98	14.76 ***
与市民的交往意愿	17.07	15.60	20.32	6.92 ***
身份融合指标				
认为是城里人		92.58%	7.42%	1400 ***
认为是本地人		71.55%	28.45%	93.00 ***
城市层级指标				
城市人均 GDP (元)	47143.13			
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元)	28766.28			
政府工作满意度指标				
维护社会公平	46.77	46.90	46.50	-0.41
行政能力表现	46.32	44.63	50.07	5.87 ***
公共服务供给	56.25	55.27	58.42	3.25 **

注：(1) 分类变量报告百分比，连续变量报告均值，但未报告标准误；(2) 差异检验的方法为卡方检验（分类变量）和 T 检验（连续变量）；(3)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三）模型设置与分析策略

以上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呈现了一种矛盾现象：虽然进城农民在城市社会中受到诸多不平等待遇，但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却高于处于相对优势的市民。对此，本文的数据分析部分将围绕两类群体在社会融合上的差异性来探究其背后的原因。在模型设定上，最小二乘法（OLS）是针对连续型因变量的普遍估计方法。然而，虽然人们对政府绩效的评价是一种个人的自主性行为，但应明确的是：个体也是嵌入其所属地域之中，且由于城市本身也具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属性，可能造成社会融合的模式、过程以及程度在不同城市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因此，考虑到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关系和嵌套关系会对政府绩效评价产生差异性影响，有必要采用分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 HLM）进行分析。

构建 HLM 模型的首要解决的是层次选择问题。对此，学术界主要采用检验随机模型（Random Intercept Model）或零模型中是否存在显著的集群效应（Cluster Effect）这一方法（陆杰华、郭冉，2017）。具体而言，我们针对三个政府满意度的因变量分别设置了个体嵌套于城市的双层零模型。对各模型的随机误差的分解结果显示，所有的组间误差均具有统计显著性（ $p < 0.001$ ），表明居民对政府的评价在

城市间的差异非常显著。而且，所有的组内相关系数^①（Intra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均符合科恩（Cohen，1988）针对建立分层模型所确定的经验标准^②。据此，本文所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将采用被调查者和其所在城市的双层随机截距模型。

在分析策略上，由于本文涉及的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集中在维护社会公平、行政能力表现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三个领域，我们将分别考察四种维度的社会融合机制对每一种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户籍分化的情况。此外，对这些差异性机制的回归分析均以嵌套模型的策略进行建模。具体而言，第一个模型除了加入控制变量外，还将户籍身份和特定的社会融合变量纳入其中。第二个模型则进一步加入上述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交互项。这样，通过观察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就可以来判断社会融合对本地市民与流动人口评价政府工作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不同以及具体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未对两类群体进行分组回归而采用全样本交互项分析，主要是因为后一种做法能够使保证模型估计的效度，并且缓解遗漏变量的问题（陈云松、张翼，2015）。限于文章篇幅，回归分析的结果将不展示个人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有关控制变量以及截距项系数，仅展示本文最关注的户籍身份、社会融合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等关键信息。

五、数据分析结果

（一）经济融合对本地市民与进城农民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影响

表3报告了城市中不同户籍群体的经济融合情况对其评价政府工作表现的影响。首先，在评价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表现上，户籍身份和经济收入均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模型1a）。但在加入了二者交互项的模型2a中，收入变量对政府绩效评价的群体性效应才在统计上显著（ $p < 0.05$ ）。具体而言，在个人年收入同时增加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对政府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评价会显著提升（0.518），但本地市民的满意度却显著降低（ $0.098 = 0.518 - 0.616$ ）。这种在效

① 零模型的总误差会被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组内相关系数 = 组间差异 / (组间差异 + 组内差异)。

② 使用分层线性模型的经验标准是：低度关联， $0.01 \leq \rho < 0.059$ ；中度关联， $0.059 \leq \rho < 0.138$ ；高度关联， $0.138 \leq \rho$ 。在以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行政能力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这三个因变量建立的零模型中，各模型的组内相关系数分别为：0.822、0.821和0.823，均属于高度关联。

应上的“一正一负”情形印证了以往研究中关于公平感形成逻辑存在群体性差异的重要发现（李培林、李炜，2007）。也就是说，在“经济决定”和“历史决定”双重逻辑的驱动下，对进城农民保持经济优势的本地市民却因与内部群体的其他人以及与自己过去状态的比较而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将不平等的根源归于政府工作的不力。相反，虽然进城农民在群体比较意义上处于弱势，但地域身份的转换却使其获得了相较于流动之前的更多收益。这种在时间维度上的利益获得感缓解了进城农民由于横向不平等所诱发的不满，进而对工作所在地的城市及其政府部门产生较高的满意度。

表 3 估计经济融合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效应的双层随机截距模型

	社会公平		行政能力		公共服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本地市民	-0.683	-1.029	-4.364 ^{***}	-4.523 ^{***}	-1.441	-1.861
经济收入	0.152	0.518 [*]	0.005	0.169	0.260	0.705 ^{**}
本地市民* 经济收入		-0.616 [*]		-0.277		-0.751 [*]
随机差异	47.400 ^{***}	47.869 ^{***}	43.368 ^{***}	43.457 ^{***}	51.345 ^{***}	51.400 ^{***}
样本量	3184	3184	3185	3185	3194	3194

注：（1）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未报告标准误；（2）^{*}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未报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教育年限、城市人均GDP对数，以及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而在政府绩效评价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公共服务供给上，经济融合针对不同户籍群体的差异性效应不仅再次显现，而且表现出明显扩大的趋势。从模型 3b 中的主效应变量和交互项可以看出，收入水平的提高对进城农民评价政府在该领域绩效的偏系数为 0.705，而对本地市民的偏系数则为 -0.046（0.705 - 0.751）。一方面，这种显著影响在方向上的不同表明：随着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外来人口对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愈加满意，而本地人的满意度却处于衰减趋势。这基本符合移民研究中经典的利益威胁假说，即外地人在城市的高度集聚有可能使市民中的大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产生对自身利益受损的担忧：本地弱势阶层关心的是就业机会以及城市公共产品的分配多寡问题（Ceobanu & Escandell, 2010; Hainmueller et al., 2011），而中上层群体则对缴纳更多的税款而忧虑（Sniderman & Piazza, 2002）。

另一方面,从作用强度比较的角度来看,经济融合对流动人口积极评价政府行为的拉动效应主要体现在公共服务层面(偏系数为0.705),而其对本地市民消极应对政府活动的削弱效应则集中表现在社会公平层面(偏系数为-0.098)。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公平感的产生需要特定的结构性条件,典型的是基于群体比较的相对剥夺机制。而公共服务更直接地影响人们的利益获得。作为城市公共品供应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市民可能对来自本群体内的贫富差距更为敏感。而对于被排除在这一体制并处于经济弱势的外地人而言,教育、社保以及住房等稀缺资源对其在城市中的生存显得尤为重要,其资源增加会带来更多的边际效益和积极心理,因而会提高对作为服务供给者的政府部门的满意度。

与上述模型结果中所表现的群体性差异不同,模型2b中的交互项系数并不在统计上显著($p > 0.1$),表明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在经济上与城市融合的程度差距并不会对他们评价政府的行政活动产生影响。我们认为,行政能力因子所涉及的环保、治安、腐败、执法等具体工作并不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实际利益获取,但对于政府形象的构建而言却意义重大,是获得政治信任以及合法性认同的重要基础(廖为建,2001)。换句话说,政府的行政能力对公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正是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户籍身份和收入水平上差异明显的全体城市居民对政府的政治行动却有着相似的认知态度。总体而言,关于经济融合机制的假设1得到基本验证。

(二) 行为融合对城里人与进城农民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影响

表4中各交互项模型的结果显示,在影响城市人口对政府工作表现的实际态度方面,行为融合机制与经济融合机制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也就是说,只有当政府的工作涉及维护社会公平与公共品分配(模型1b和模型3b),而非行政能力时(模型2b),文化行为才会使不同户籍群体对管理部门的满意度出现明显不同。具体而言,愈加明显的城市性文化活动有助于全体城镇居民更加认可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平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上的绩效(模型1a和模型2a)。但交互项模型的分析清楚地表明:文化行为对进城农民评估政府在上述两项工作的满意度的提升效应分别达到了3.270和2.530,而对本地市民的拉动作用仅为1.078($3.270 - 2.192$)和0.83($2.530 - 1.700$)。虽然描述性分析的结果显示,进城农民对在城市文化的融入程度上要明显低于城里人(1.21 vs 0.75),但文化行为对流动人口积极评价政府工作具有远超出

本地人口的影响。对此的解释是：由于工资收入上的差距与户籍制度的限制，进城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较弱，因而和本地人形成了明显的文化落差（陈云松、张翼，2015）。然而，一旦这种稀缺性因文化资源的补充而获得缓解，就能够对流动人口产生更有力的心理调适作用。

表 4 估计行为融合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效应的双层随机截距模型

	社会公平		行政能力		公共服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本地市民	-1.023	-1.436	-4.456 ^{***}	-4.379 ^{***}	-1.679	-1.996
文化行为	1.605 ^{**}	3.270 ^{***}	0.456	0.146	1.236 ^{**}	2.530 ^{**}
本地市民* 文化行为		-2.192 [*]		0.407		-1.700 ⁺
随机差异	46.530 ^{***}	46.624 ^{***}	43.356 ^{***}	43.253 ^{***}	51.142 ^{***}	51.715 ^{***}
样本量	3182	3182	3183	3183	3192	3192

注：(1)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未报告标准误；(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未报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城市人均 GDP 对数，以及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此外，行为融合机制与经济融合机制在影响不同户籍群体如何评判政府绩效上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首先，在对政府不同类型绩效的评估中，文化融入对流动人口满意度的提升效应更充分地体现在社会公平领域（偏系数为 3.270），这与经济融合机制主要通过公共服务领域来影响该群体的政府态度形成明显的差别。事实上，流动人口即使可能在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中获得相较于其在农业中更高的收入，但其在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由城市正式制度所设置的门槛限制，而且很容易受到本地人的冷遇和歧视（阎友兵、蒋晟，2006）。特别是在城镇内部的户籍收入差距弥合有限的背景下，文化资源的获取对进城农民具有一种超越经济利益的深层次意义，因而会影响其对包括公平问题在内的社会结构的认知态度。

其次，对于市民而言，收入水平对其评价政府在消除贫富差距和公共服务供给均具有负面效应。但文化行为则对该群体在上述两方面的政府工作评价中都能够产生积极效应。我们推测，这可能是因为本地人深受城市性文化的熏陶，并且对这一类型资源的获取可以通过货币购买的方式来得到保证。也就是说，文化活动对市民而言已成为一种日常性的生活方式，并且他们在认知上习以为常，不具有结构性意义（王雅林，2003）。因此，假设 2 在大体上得到验证。

(三) 心理融合对城里人与进城农民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影响

表5报告了“与城里人交往”和“与农民交往”这两个心理融合指标对城镇居民评价政府绩效的影响结果。首先,正如模型1b和模型3b所显示的,与市民交往意愿的高低并不影响进城农民对政府在解决社会不平等以及行政能力上的评价(p 均大于0.1)。不过,与流动人口相比,城里人与本群体内的其他成员的交往却会使他们对政府在上述两个领域的工作表现的认可度显著降低,分别为-0.185(-0.048-0.137)和-0.166(-0.01-0.137)。很明显,上述发现一方面再次证明了市民群体的公平感主要是通过其与本群体内的不同成员进行比较后而形成的。另外,由于本地人口与城市政府的经济社会联系更加密切,其对政府在经济领域以外的活动也有着较高的关注度。而群体内部之间的高频率交往则加速了有关政府信息的传播过程,但这种大范围的扩散也往往会使信息失真,甚至发生扭曲,最终影响对政府形象的判断(朱光喜等,2006)。相比之下,农民进城则是以增加经济收益为首要目的,而且该群体的流动性特征使其先天地难以和流向地政府建立亲和性关系。因此,即使与本地人进行交往,也大多限于闲聊、相互问候等礼节性内容,很难涉及关于政治事务的探讨上(刘林平,2008)。

其次,模型2b的结果显示,作为心理融合的另一侧面,与农民交往对进城农民评价政府在维护公平上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本地人的评价态度具有拉动效应($0.089 = 0.000 + 0.089$)。显然,当市民的交往对象从本阶层的其他成员变化为处于明显弱勢的流动人口时,最初的相对剥夺感可能转化为心理优越感,极大地减轻自身利益受损的认知,进而使其对社会分配的公平性感知不断加强。而模型4b中交互项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则表明($p > 0.1$):市民群体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满意度并不受到是否与农民交往的影响。相反,主效应在统计上的显著($0.087, p < 0.1$)则表明:与农民的同质性交往能够显著增强进城农民对政府行政活动的好感。这一发现可以在城市政府治理流动人口的具体策略中得到解释。进城农民间的互动主要是在作为落脚区域的“城中村”或城乡接合部而展开,但在传统城镇化发展模式下,这种高密度居住也面临着被政府部门清理整治的风险(李培林,2002)。因此,地方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处理方式的不同,必将影响进城农民的生存状态,他们也会据此在情感和行动上作出回应。而在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上的评价上,与城里人交往会使全体城镇居民作出消极的反应(模型5a),但与农村人交往则会产生积极的作用(模型6a)。不过,交互项模型的结果表明,这两种心理融

合指标在总体层面的“一正一负”效应均未呈现基于进城农民与本地市民的群体性差异（模型 5b 和模型 6b）。

综合来看，当城里人与本群体内部的其他人交往时，对政府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绩效评价更加消极，而与农民交往时则变得更加积极。然而，对行政能力的积极评价仅能通过市民之间或者是进城农民之间的同质性交往来实现。由此可见，相较于市民群体而言，进城农民内部的团结对其是否认可政府绩效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心理融合能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之间异质性交往的展开，这也是为双方建立情感联系的行动基础（狄雷、刘能，2014）。而这种仅限于群体内的互动模式无疑会强化群体间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差异，使城镇内部二元分割结构进一步加剧。因此，假设 3 得到部分验证。

（四）身份融合对城里人与进城农民评价政府工作绩效的影响

表 6 展示了身份融合机制对不同户籍群体关于政府绩效满意度的影响结果。首先，在评价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表现上，模型 1b 显示，即使本地市民和进城农民都在同一地理空间内共存，但这种城市身份感并不能显著影响两类人群对政府的认可程度。而从包含身份融合的另一指标的模型 2b 可以看出，有着更强烈的“本地认同感”的进城农民对政府在应对社会不平等的作为感到不满（ $p < 0.05$ ， -4.892 ），但这种文化地域意义上的身份认同对本地市民评价政府的有关表现并不产生显著影响。实际上，对新生活场域的较高预期是外地人与其建立认同的先决条件。但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后来者”不仅自身可能经历因生活方式的转型而出现心理和行为方面的不适，而且来自本地人的歧视以及诸多制度障碍极易使原初期望受挫，从而增加了形成不公平感的可能性。

而在行政能力领域，身份融合对进城农民消极评价政府绩效的效应更加凸显。模型 3b 和模型 4b 的结果显示，“城市身份感”（ -4.482 ， $p < 0.05$ ）和“本地身份感”（ -5.715 ， $p < 0.001$ ）使进城农民显著降低了对政府在政治性事务上的绩效评估，但对本地市民的态度却没有显著影响。显然，引发外地人对政府不满的根源除了基于本地认同的“预期受挫”机制外，在“城市认同”上出现的问题无疑同样重要。即使有着多年城市生活经验的农民已建立起明确的城市认同，但来自户籍制度的结构性条件的限制则使其无法在现实中得以转化，因而可能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而且，流动人口在城市立足的合法性、居住条件、就业获取等切身利益也可能因某

表 5 估计心理融合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效应的双层随机截距模型

控制变量	社会公平						行政能力						公共服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城里人	-1.104	-0.914	-0.2	-0.801	-4.746	-4.557	-3.708 ^{***}	-3.821 ^{***}	-1.85	-1.766	-0.794	-0.958						
与城里人交往	-0.138 ^{***}	-0.048			-0.107 ^{***}	-0.018			-0.124	-0.084								
城里人* 与城里人交往		-0.137 ^{**}				-0.137 ^{**}				-0.062								
与农村人交往			0.073 ^{***}	0.000			0.100 ^{***}	0.087 ⁺			0.100 ^{***}	-0.08						
城里人* 与农村人交往				0.089 ⁺				0.017				0.024						
随机差异	47.743 ^{***}	48.649 ^{***}	47.177 ^{***}	47.431 ^{***}	43.118 ^{***}	43.611 ^{***}	42.178 ^{***}	42.187 ^{***}	51.140 ^{***}	51.037 ^{***}	49.310 ^{***}	49.329 ^{***}						
样本量	3181	3181	3181	3181	3182	3182	3182	3182	3191	3191	3191	3191						

注：(1)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 未报告标准误；(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未报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城市人均 GDP 对数 以及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表 6 估计身份融合对政府工作满意度效应的双层随机截距模型

控制变量	社会公平						行政能力						公共服务					
	模型 1a	模型 1b	模型 2a	模型 2b	模型 3a	模型 3b	模型 4a	模型 4b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模型 5a	模型 5b	模型 6a	模型 6b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本地市民	-1.317	-1.117	-0.222	-3.065	-2.570 [*]	-3.187 [*]	-3.845 ^{***}	-7.641 ^{**}	-1.185	-0.446	-1.653	-3.631						
认为是城里人	1.194	1.589			-3.262 ^{**}	-4.482 [*]	-3.470 [*]		-0.396	1.068								
本地市民* 认为是城里人		-0.572				1.771				-2.119								
认为是本地人			-3.203 [*]	-4.892 [*]				-5.715 ^{**}			1.312	0.132						
本地市民* 认为是本地人				3.326				4.438				2.319						
随机差异	47.810 ^{***}	47.796 ^{***}	47.019 ^{***}	47.089 ^{***}	42.894 ^{***}	42.872 ^{***}	42.317 ^{***}	42.472 ^{***}	51.890 ^{***}	52.062 ^{***}	51.353 ^{***}	49.329 ^{***}						
样本量	3177	3177	3178	3178	3178	3178	3179	3179	3187	3187	3188	3188						

注：(1) 表中报告的是标准化回归系数 未报告标准误；(2) $^+ p < 0.10$,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3) 未报告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对数、城市人均 GDP 对数 以及城市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些政府行为的强制介入而遭受损失，影响其日常生活的正常开展。因此，对于将自身与城市以及本地紧密联系的外地人而言，其对政府的好感度无疑会因导致认同联系中断的执法活动而大幅降低。

此外，模型 5a 和模型 6a 的结果表明，与心理融合机制不同，在所有城市人口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评价中，代表身份融合的两个指标“城市身份感”与“本地身份感”都不具有总体性效应（ p 均大于 0.1）。而含有交互项的模型 5b 和模型 6b 进一步显示，拥有不同身份认同感的市民和外地人口在评价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表现上并不存在显著的不同（ p 均大于 0.1）。

总之，本地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与其对城市以及本地的身份融合程度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联。但对于进城农民而言，不仅“本地认同感”会降低其对政府消除贫富差距的绩效评价，而且政府行政能力的受认可程度还受到该因素与“城市认同感”的负向的联合效应。上述发现表明，虽然身份融合对两类群体的政府满意度具有不同的效应，但与本文所预设的影响方向相反，因而假设 4 未得到验证。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对社会融会议题展开了全新讨论，从以往学术界所注重的原因分析拓展至政治效应的研究上来，重点考察本地市民与进城农民在城市社会的融合过程与政府满意度变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实证层面，我们针对经济、行为、心理以及身份等四种维度的社会融合机制对由社会公平、行政能力与公共服务所组成的政府绩效结构的真实效应进行了细致分析，其结果基本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差异化政府满意度效应”假说，即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过程对进城农民积极评价政府绩效有着比本地市民更强有力的提升效应。具体来说，收入水平的提升、城市性文化活动频率的增加以及群体内部的内质性交往，都能够显著增强进城农民对政府解决社会不平等、提供公共服务以及优化行政能力等工作的积极评价。从市民角度来看，虽然行为融合能够提升其对政府维护公平的满意度，但经济融合以及以内质性交往为主的心理融合反而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另外，身份融合机制的作用方向则有悖于本文的假设。也就是说，即使进城农民有着明显的“城市身份感”和“本地身份感”，但这种认同联系未能促进其对政府行为的好感度，反而产生了明显的削弱

效应。

上述研究发现充分展示了以往学术界在讨论社会融合问题时尚未发现的一面：社会融合不单单是异群体在新社会空间不断调适自身的微观行动过程，而且在政治层面对明确政府绩效优化的方向和策略发挥着结构性影响。不过，由于传统粗放型城镇化的推进模式在客观上制造了基于户籍身份的诸多不平等效应（柳建坤，2017），这就为围绕流动人口来提升城市治理效力的制度障碍。对此，中央政府在2015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中已针对为实现农民“市民化”提出了成本分担机制，这为促进经济利益的公平分配提供了新的思路。

但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完成新文化身份的构建则是完成社会融合的最终环节，而身份认同所展现的关键性与复杂性决定了社会融合过程必然在规律上表现出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在未来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型的过程中，既要保持习近平总书记对该问题所强调的“历史耐心”（王炬鹏，2014），又要为进城农民建立基于地域与文化上的身份认同感创造有利的现实条件。我们认为，“包容性”作为革新城市社会治理的理念与决策已经刻不容缓，并以此推进对流动人口的工作模式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尊重这一弱势群体在居住、就业以及日常性交往等方面的基本权利，重点解决贫富差距、公共服务不足以及行政能力低下等关键问题，提倡多元、开放与包容的城市文化生态，使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在经济、行为、心理以及身份上实现递进式发展，最终为城市政府治理体系的健康运行构筑坚实的民意基础。

当然，本文尚有一定的不足之处。首先，本研究对于社会融合与政府满意度之间因果关联的探索在逻辑链条上仍不明晰。其次，因变量所涉及的评价对象并不明确。由于CSS2011问卷对于“政府工作满意度”问题的询问没有区分出层级差异，这使我们无法明确城镇受访者的态度究竟指向的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抑或是二者皆有。由于中国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区别，因变量所指对象的模糊性问题无疑会影响作用机制的解释。最后，本文参照学术界的既有框架来解析“社会融合”这一核心自变量，其维度虽然已覆盖经济、行为、心理和身份等诸多方面，但这种理论上的分类方式难免会有所疏漏或彼此重叠。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将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理论、数据和方法层面的改进来加以解决。

参考文献：

蔡禾、曹志刚，2009，《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及其影响因素——来自珠三角的实证分析》，《中山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第1期。

蔡禾、李超海、冯建华, 2009, 《利益受损农民工的利益抗争行为研究——基于珠三角企业的调查》, 《社会学研究》第1期。

陈云松、张翼, 2015, 《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与社会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陈振明, 2003, 《政府再造: 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述评》,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成伯清, 2009, 《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 《探索与争鸣》第10期。

程遥, 2012, 《健康城镇化背景下的流动人口发展趋势与对策》, 《经济地理》第4期。

狄雷、刘能, 2014, 《异质性社区的社会交往与社区认同——北京沙村的个案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风笑天, 2004, 《“落地生根”? ——三峡农村移民的社会适应》, 《社会学研究》第5期。

冯仕政, 2006, 《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 《社会学研究》第3期。

高学德、翟学伟, 2013, 《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 《社会学研究》第2期。

国家统计局课题组, 2007,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 《调研世界》第1期。

胡荣, 2007,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社会学研究》第3期。

胡荣、胡康、温莹莹, 2011,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社会学研究》第1期。

怀默霆, 2009, 《中国民众如何看待当前的社会不平等》, 《社会学研究》第1期。

黄宗智, 200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上海: 中华书局。

黄宗智、彭玉生, 2007,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

李保臣、李德江, 2013, 《生活满意感、政府满意度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2期。

李路路、唐丽娜、秦广强, 2012, 《“患不均, 更患不公”——转型期的“公平感”与“冲突感”》,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李培林, 2002,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李培林、李炜, 2007,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社会学研究》第3期。

李培林、田丰, 2011, 《中国新生代农民工: 社会态度和行为选择》, 《社会》第3期。

李树苗、任义科、靳小怡、费尔德曼, 2008, 《中国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分析》, 《人口与经济》第2期。

李煜, 2017, 《利益威胁、文化排斥与受挫怨恨——新“土客”关系下的移民排斥》, 《学海》第2期。

廖为建, 2001, 《论政府形象的构成与传播》, 《中国行政管理》第3期。

刘林平, 2008, 《交往与态度: 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对广州市民的问卷调查》,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柳建坤, 2017, 《户籍歧视、人力资本差异与中国城镇收入不平等——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社会发展研究》第4期。

陆杰华、郭冉, 2017, 《基于地区和社区视角下老年健康与不平等的实证分析》, 《人口学刊》第2期。

- 陆奇斌、张强、张欢, 2010, 《基层政府绩效与受灾群众满意度的关系》,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4期。
- 陆益龙, 2006, 《社会需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均衡点分析》, 《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
- 罗家德、秦朗、方震平, 2014, 《社会资本对村民政府满意度的影响——基于2012年汶川震后调查数据的分析》,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第6期。
- 马磊、刘欣, 2010, 《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5期。
- 皮亚杰, 1982, 《儿童的心理发展》, 傅统先译,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彭希哲、郭秀云, 2007, 《权利回归与制度重构——对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创新的思考》, 《人口研究》第4期。
- 任远、乔楠, 2010, 《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 《人口研究》第2期。
- 任远、邬民乐, 2006,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 《人口研究》第3期。
- 宋月萍、陶椰, 2012, 《融入与接纳: 互动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实证研究》, 《人口研究》第3期。
- 苏黛瑞, 2009, 《在中国城市中争取公民权》, 王春光、单丽卿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孙立平、王汉生、王思斌、林彬、杨善华, 1994,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田丰, 2017, 《逆成长: 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十年变化(2006—2015)》,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汪晖、陶然, 2013,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 难点、突破与政策组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王春光, 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第3期。
- , 2003,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地位的变化》,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4期。
- 王嘉顺, 2010, 《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社会》第6期。
- 王炬鹏, 2014,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有历史耐心》, 新华网12月11日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12/11/t20141211_4104306.shtml)。
- 王晓莹、罗教讲, 2016, 《生活境遇与政府工作满意度——基于对C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1期。
- 王雅林, 2003, 《城市休闲》,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尉建文、谢镇荣, 2015, 《灾后重建中的政府满意度——基于汶川地震的经验发现》, 《社会学研究》第1期。
- 邢朝国、陆亮, 2015, 《交往的力量——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社会距离》, 《人口与经济》第4期。
- 邢春冰, 2008,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 《管理世界》第5期。
- 许传新, 2007,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学术探索》第3期。
- 阎友兵、蒋晟, 2006, 《农民工休闲活动现状及改进措施》, 《城市问题》第7期。
- 杨菊华, 2009, 《从隔离、选择融入 to 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 《人口研究》第1期。
- , 2010,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人口与经济》第2期。

- 悦中山、李树茁、费尔德曼, 2012, 《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欢、张强、陆奇斌, 2008, 《政府满意度与民众期望管理初探——基于汶川地震灾区的案例研究》,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第 6 期。
- 张文宏、雷开春, 2009, 《城市新移民社会认同的结构模型》, 《社会学研究》第 4 期。
- 张翼, 2008, 《当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第 2 期。
- 赵鼎新, 2012,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第二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长城、徐鹏, 2014, 《社会地位与生活体验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影响——以中国村镇居民为例》,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 4 期。
- 朱光喜、王赵铭、万细梅、郑瑜怡, 2006, 《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形象和政府危机公关》, 《公共管理学报》第 2 期。
- Saich, Tony, 2006, 《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 中国农村和城市的民意调查》, 《公共管理评论》第 2 期。
- Auh S & C. C. Cook 2009, "Quality of Community Life Among Rural Residents: An Integrated Model."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94 (3).
- Ceobanu, Alin M & Xavier Escandell 2010, "Comparative Analyses of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nts and Immigration Using Multinational Survey Data: A Review of Theories and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6.
- Clarke, Harold D, Dutt Nitish & Kornberg Allan 1993,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ttitudes toward Polity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55 (4).
- Cohen, Jacob 1988,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illsdale, NJ: Erlbaum.
- Cusack, T R. 1999, "The Shaping of Popular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and Regime Performance in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 (4).
- Grant, Adam M. 2008. "Does Intrinsic Motivation Fuel the Prosocial Fire? Motivational Synergy in Predicting Persistence, Performance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93 (1).
- Hackman, J Richard & Oldham Greg R. 1976, "Motivation through the Design of Work: Test of a Theor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6 (2).
- Hainmueller, J., M. J. Hiscox & Y. Margalit 2011, "Do Concerns about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Shape Attitudes toward Immigration?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7 (1): 193 - 207.
- Herzberg, Frederick I. 1966, *Work and the Nature of Man*.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 Mannheim, Karl. 1936,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by Wirth & Shil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 Morgeson, F V. 2013, "Expectations, Disconfirmation and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Testing and Expanding the Mode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3 (2).
- Oliver, Richard L. 1980, "A Cognitive Model of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Satisfac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7 (4).
- Park, Robert. 1928, "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 Putnam ,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 .
- 2000 ,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 Requena , F. 2003, "Social Capital , Satisfa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Workplace. "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61 (3) .
- Roskrige , Matthew , Grimes Arthur , McCann Philip & Poot Jacques 2013, "Homeownership , Social Capital and Satisfac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 " *Urban Studies* 50 (12) .
- Roth , Victor J , Lorne Bozinoff & Peter MacIntosh 1990, "Public Opinion and the Measurement of Consumer Satisfaction with Government Services. "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33 (4) .
- Salehi K H & A. Heydari 2012, "Measuring Villagers' Satisfaction about Performance of Village Government at Shemiranat in Large Lavasan: A Scope for the Use of Model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Resource & Stress Management* 3 (1) .
- Scheve , Kenneth F , & Matthew J. Slaughter 2001, "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s over Immigration Policy.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3 (1) .
- Sniderman , Paul M. & Thomas Leonard Piazza 2002. *Black Pride and Black Prejud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olinger , Dorothy J. 1999 ,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 the State ,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Ryzin , Gregg G. 2004, "Expectations , Performance and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Urban Services. "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 Management* 23 (3) .
- 2007, "Pieces of a Puzzle: Link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 , Citizen Satisfaction and Trust. "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30 (4) .
- Wu , Xiaogang 2009, "Income Inequality and Distributive Jus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 *The China Quarterly* 200.
- Yeşilyaprak , Binnur & Boysan Murat 2015, "Latent Class Analysis of Job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School Counselors: A National Survey. "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6 (1) .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柳建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张柏杨 陈云松)

责任编辑: 罗 婧

agreement on a certain asse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provincial oil market in China , this article forms a concept of “dilemma of consideration” for a phenomenon that both sides of a merging case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reach a deal but the certain mechanisms fail. There are three sorts of failures: the failure of clientelism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loses the capacity and willingness to protect private investors; the failure of techniques when a calculative basis missed; the failure of discourses when the moral appeals surpass the economic appeals. The failures of mechanisms essentially root in an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repreneurs , and ironically , the consensus for the growth coalition turns out to be the obstacles for achieving a new deal for consideration when the coalition collapsed. It calls for a new type of state-business relation based on a more equal configuration am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local governments ,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 and private investors for a sustainable growth of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in Debt Financing of Listed Compani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Beijing’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 *Xia Qi & Wang Cuntong* 105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cio-economic player , the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are always embedded in the social network , including the financing behavior. This paper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embdd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bt financing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 as well as their effec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mbeddedness” 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to analyze listed company debt financing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theory , and to compare with the explanatory utility from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 of Beij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2015 shows that the listed companie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its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debt financing level.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restrains its debt financing behavior and presents a characteristic of “equity financing preference” .

The Diversified Effects of Social Assimilation on the Satisfaction of Governments’ Work between Groups Differentiated b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SS 2011

..... *Liu Jiankun , Zhang Boyang & Chen Yunsong* 127

Abstract: We explore the various effects of social assimilation on the evalu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s by different groups differentiat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CSS2011) and urban macro-level data ,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ocial assimilation has a stronger promotion on the increase of the positive evaluation of peasan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More precisely , the increase of income levels and the frequency of urban cultural activities , and the homogenous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group may have significantly optimized the perception towards government’s ability of confronting with social

inequalities ,providing public services and optimizing the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y. But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has reduced satisfaction on government work in economic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aspects. However , in terms of identity integration , urban identity and local identity did not enable peasants positively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and even reduced the evalu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 In term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urban governments need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inequality of the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goods , which would further encourage heterogeneous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strengthen the their identity sense to the urban society.

The Analytical Logic of Weak Ties Strength: A Comparison between Absolutism and Relativity

..... *Liu Youchi* 154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ocial networks is attract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refore ,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a deeper analysis of certain basic concepts and its internal logic. This paper analyzes a basic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namely , weak ties strength. We analyze two research paths in the ties strength analysis of social networks , which are named as the Absolutism and the Relativity of ties strength analysis.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definition , basic logic , the concepts and logic of use in egocentric networks analysis ,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alysis, “bridge” ties analysis and propagation analysis between the two research paths , and investigates the strengths of weak ties and strong ties.

Urban Memory and Incorporating Practice of Small Urban Farmers: A Study on Farming Life in Z Space in Chongqing

Zhang Yiming 173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corporating practice of small urban farmers in Z space , an urban farmland in Chongqing. It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ncept of memory glimmer and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surpassing *Les Lieux de Mémoir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emory glimmer only exists among retired workers in Z space , thus the concept of small urban farmers only represents retired workers. On the one hand ,the *An Steel Constitution* encourages workers to struggle in the factory for life and leap-forward to complete the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of collective production , which conflicts with the needs of new workers to take care of their families , making a separation between the production and the life of workers. They have to grow plants to fulfil their own desires , inducing their memory glimmer. On the other hand , small urban farmers still retain their urban farmlands and the habit of growing vegetables , even though they are facing the impact of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 collision of moving farmers and the oppression of macro narratives. It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of incorporating practice and living spaces for memory glimmer.